

不断求索的学者

——陈东琪小传

(上接 02 版)

20 年后,2012 年 7 月 9 日,江泽民同志邀请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和林毅夫 6 位当年参加此工作的同志座谈,回顾 20 年前 11 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回顾当时是怎样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其发展为何既快又稳的现状”;是怎样分析“苏联东欧巨变的经验教训”;是怎样分析“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历史过程,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创新驱动的持续发展模式提出建议。江泽民同志在回顾会议上指出:

“之所以要说这段历史,是想回顾 1991 年我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目标,提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缘由。回顾 20 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未来,今后 10 年至 20 年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驱动? 决不能走老路,要有改革现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要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集思广益,为党的十八大后开创新局面提供建议。”在 20 年后才解密的一段改革理论史的人物名单中,陈东琪是其中之一位,而且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2. 提出“稳中求进”大思路,倡导渐进式改革和微调

1987 年,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前期改革成果的巩固面临很大挑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 1988 年至 1995 年这 8 年的综合改革规划(也称“3-5-8”规划)。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由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率领,陈东琪为主要执笔人。根据当时现实和对未来中国改革的可能前景预测,课题组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后来简称稳中求进)的总体改革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是:中国的发展要避免大起大落现象,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在实现企业机制转换、建立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市场参数调节微观不平衡外,同时要改革宏观调节机制,改善宏观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政策有效性。“稳中求进”的“稳”强调既要稳定增长,政府政策操作要平缓、渐进,多用微调方式;“进”强调要在重新构建有利于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上,加快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机制三个层次的改革,全面推进制度创新,“也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前三年,稳中求进,以稳为主,有选择地深化本环境改革,为后五年改革推进创造一个有利的时期。”“后五年改革的阶段性策略重点是由‘稳’转‘进’,在‘稳中求进’总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步子可以大一些、快一些。这五年是中国改革的大推进时期,或者叫体制模式的大转换时期。”

后来的实践证明,作为中国第一个改革顶层设计的成果,“3.5.8 改革方案”因为“六四”而流产,但“稳中求进”被政府多次采纳,多年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总体指导方针。作为“稳中求进”的设计者之一,陈东琪在后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体现了一思想,在《强波经济论》和《微调论》中阐述的“双向微调”,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等论著中贯穿了这一红线。

他强调,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微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繁荣到来之前,要注意运用逆向微调而不是急剧扩张或急刹车的调控方式。除了在萧条前的刺激和过热期的紧缩的综合政策力度强一些以外,其他时期的综合政策力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小,尽可能采用“经济下行则向上微调,经济上行则向下微调”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障平稳增长。

在陈东琪看来,微调有几个重要特征,一是要打提前量,不能“到跟前才动手”,就如同开汽车一样,要避开障碍,规避或减少风险,要提前“点刹”,不要到跟前踩急刹车,否则容易翻车;二是单次调整的幅度要小,各次调整之间的频率要高,如出税率、利率、汇率等政策措施的变化率要比较小;三是要注意正确引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来逐步逼近调整目标;四是所有调控行为不能伤害企业元气,不能排斥竞争,不能挤压市场功能,不能为长期均衡和稳定增长设置障碍。

这些观点,对推动渐进式改革,制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稳健主义的宏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稳中求进”的思想贡献,以刘国光、张卓元为课题负责人,戴国晨、沈立国、陈东琪为主笔人的《中国经济体制(1988-1995)改革纲要》获得了 1988 年度孙治方经济学奖,正如张卓元教授所说,陈东琪为提出和倡导“稳中求进”做出了直接贡献。

无论是从 1987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还是从对他访问的言谈看,陈东琪教授显得比较温和,言语表达比较中性的,不走极端,给人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感觉,“稳”是他论著和言谈中用得最多的字。这种具有中国儒家文

化风格的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其思想也更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因为在决策者看来,渐进式的成本比较小,风险比较低,可以留出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机会。

3. 主张改革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合股制”构想

陈东琪的出生地,离毛泽东、齐白石的家 20 多里,离彭德怀的家 30 多里,离刘少奇、左宗棠的家 50 多里,离曾国藩的家不过 100 里,这是一个真正出伟人的地方,可谓人杰地灵。有一位中国史学家说过,“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近、现代中国史”。的确,这里出过很多伟大人物,有国家领袖,大政治家;也有大军事家,国家大元帅;更有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个性鲜明,共性突出:有远大理想,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意识;对环境敏感,悟性好,善于把握和运筹未来;办事执着、不怕死;血脉中,忠孝、耿直、正义、土根思想浓厚。我们从陈东琪的身上,多少能看出这些特质,只是他的农家观念和土根思想更浓、更重,就像他来北京 30 多年,而谈话还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一样。

1988 年底,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计划出一套《中国改革研究丛书》,他要担任常务副主编的陈东琪,约一位学者写一本关于土地改革的陈佳贵,陈佳贵首先想到的是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和农村研究所的农业问题研究专家,而是活跃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陈东琪来担当此任。陈东琪很快答应了陈佳贵的约请。后来我问陈东琪教授:“您当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为何写土地方面的书?”他回答说:

“其实,我最早的身份是农民,最早的职业是农业,我在农村土地上生,在农村土地上长,到北京读书、搞研究,还是离不开对家乡土地的眷恋,离不开在水田播种、插秧、踩田、扮禾的体验,离不开‘背朝太阳手插泥’的情景回忆,离不开对土地、对农民、对家乡的怀念。”

这些眷恋、怀念和感情,体现在 1989 年 6 月出版的《新土地所有制》一书中。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理论观念和现实制度变化巨大,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地方人们还是不敢深度触碰,这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理论界最大胆的观点也不过是提“土地(承包权或使用权)流转”,而陈教授 25 年前就触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提出“农村土地合股制”构想。

《新土地所有制》一书篇幅不长,只有 8 万字,但从改革的角度看,内容相当丰富,思想非常超前。全书 10 章,第 1 章提出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等途径,解决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耕地危机”问题,第 2-4 章谈土地制度问题;第 5-10 章谈建立土地市场、发展规模农业和土地的宏观管理问题。在论述土地制度改革中,陈东琪指出:

中国农村土地“从集体统一经营到家庭承包经营”是一个重大变革,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局限性”,长远目标是进行“土地所有权变革”。

他在对比“土地国有化”、“稳定集体所有制”和“重建农户私有制”这三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基础上指出:

“这三个思路都不是深化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最佳思路,最佳选择是‘土地合股制’。他说:

“在中国高市场化规模农业既不能走土地国有化道路和集体化道路,又不能走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道路,而应当在完善农户私营和合股经营制度的同时建立多户自由组织的农民对土地合股所有制。”

土地合股制如何建立? 陈东琪设想:

通过两种“初始购买”形式,让农民支付一定代价“从国家手里得到土地所有权”,再“以入股方式和他人组合占有”。在这种土地合股制度下,“单个农民只拥有土地股票,并取得土地身份,其土地所有权,由自由联合股控制。它既是私有的又具有部分社会化性质,因此土地合股制又是一种‘社会的个人所有制’。”

在陈东琪看来,这种“可以自由买卖和继承”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一种“‘公’‘私’相容的基本选择形式之一”,是“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促进增长的崭新制度”,“有利于土地所有权流转和集中”,“可望克服单一个体农民所有制向的缺点,便于组织规模经营,由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同时可以排除国有化和集体化必然产生的直接行政干预,便于把规模农业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2012 年,思想敏锐的德国人将一项“农民奖”授予取消农业税的时任总理温家宝,我想,如果陈东琪在 20 多年前提出的“合股制构想”变成现实,以此缓解中国不断增强的粮食需求,仅有《新土地所有制》这本书,陈东琪就应该受到经济学界的嘉奖,因为这个构想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说解放思想容易,践行解放思想难,在中国,解放思想更难。《新土地所有制》一书出版,正值“六四”,该书出版不久,被称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对象,小平南巡讲话后,虽然经济学界对改革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



但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人们一直心有余悸,不敢直谈、多谈。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开始在进行土地合股制实践。山东胶州市胶北、胶东、洋河、李哥庄、马店等镇,对 2.1 万亩土地实行土地入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农民成为土地股民,“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有地不用种,在家就分红”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事。(见《经济参考报》2008 年 10 月 17 日修国华文。)

迄今为止,国家层面的土地问题讨论,还停留在“土地流转”,中央文件还没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导向,“土地合股制”还没有向前推演,一旦时机成熟,陈东琪 20 多年前的“土地合股制构想”一定会在未来某一时期变成国家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重要选项之一。

4. 推动政府体制改革,主张建立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陈东琪一方面关注市场化的微观基础重构,特别是关注企业组织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赞成先通过承包制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改制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变为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新市场主体。这些思想体现在他发表的许多论文和研究报告之中。

另一方面,他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政府”,研究对政府的总体规模、机构设置、人事组织、职能选择、管理方式、政策操作、部门协调、外部制衡和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思想,体现在《强波经济论》(1992)、《新中国经济变迁与分析》(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1995、1997、2000)、《微调论》(1999)、《新政府干预论》(2000)、《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2005)以及后来与人合作出版的一些著作中。

陈教授主张,全面改革政府体制,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下,重新界定和转变政府职能,将更多权力和职能交给市场、企业和社会,通过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改造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体制,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精简有效的“新政府”。

为什么要改造“旧政府”体制,建立“新政府”体制呢? 陈教授受哈耶克和锡克的影响,认为政府有局限性,存现实中存在在政府失灵,据此他提出了四个假说,即:

- 政府信息不足或信息丢失假说;
- 政府决策过程成本过大假说;
- 政府决策者智慧不足假说;
- 政府决策者(既得)利益约束假说。

根据这四个假说,陈东琪教授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和深化,政府应当从一些领域逐步退出来,逐步下放权力,变宏观集权为微观分权,否则会挤压市场,限制企业,牺牲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破坏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降低效率。

事实确实这样。政府做出一个产业决策政策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国务院领导向某部委主任批示,主任再给分管副主任批示,分管副主任给他所分管的司长批示,司长最后批给专业处,这个专业处通常只有几个人,最后由这几个人做出一个方案再自下而上上报,然后高层讨论决定。显然,这个决策逃不脱上述四个假说所指出的弊端和缺陷。按照这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的决策去做,最后必然出现与市场精神相矛盾的“三位”(错位、缺位、越位)错误,出现政府失灵,出现“政府自己制造产能过剩,之后又由政府解决产能过剩”的怪圈。因此,陈教授指出:

“我们对政府决策者来说,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其能力的局限性而言,政府不能把所有事情做好。……,即使是比较成功的政府干预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说明政府干预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怎么办呢? 陈东琪提出“最优政府规模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效能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政府规模选择的位置应落在它带来的成本最小和效益最大的那一点上,也就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相等

的那一点上”。

根据他提出的最优政府规模理论,陈东琪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府规模太大,应当大幅度缩小,应当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应当再造政府体制,而这里的“关键是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要做的主要事情,不是自己去直接投资、直接分配,去直接参加与民争利的活动,而是维护市场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歧视、可以平等竞争的企业发展环境”。

陈东琪后来许多关于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以这个“新政府”理论为核心支点的。这些核心支点,为后来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向。

5. 独倡“强波理论”,主张用“双稳健”防大萧条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陈东琪教授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周期和改革以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市场化改革既带来了加速增长,也使经济变得较为稳定,经济的周期波动出现收敛,计划时期的古典长期运行和发展显现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每隔 30-50 年一次的大循环周期(长波)轨迹。在每一次长波中,又会有几次 10 年一次的中波。在每一个中波中,可能有一、两个短波。

根据陈东琪教授的长波理论,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长波;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00 年代末”,中国经济运行在第四个长波之中,到目前为止,这个长波还没有结束。推动经济长波繁荣的主要动力是制度创新和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每一次长波又包含几个十年左右一次的中波。到 2009 年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次中波:1980-1989 年、1990-1999 年、2000-2009 年,2010 年开始进入第四个中波,这也是中国走创新驱动、内需扩张、均衡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时期。

独具特色的强波理论和长波认识,为陈东琪提出务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也在多次应对周期波动的政策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2002 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置身于“9·11”后世界经济的波动中,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掉下来。6 月,在某次高层政策座谈会上,陈东琪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从调整阶段,步入新一轮中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有限的,2002 年中国经济会经过先抑后扬的过程,“十六大”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下滑。事实最终印证了他的判断。

2003 年面对 SARS 给中国带来的普遍恐慌,陈东琪同样是在高层经济形势与政策座谈会上乐观地提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 SARS 的蔓延,这场危机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的冲击,不会危及会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经济仍将在快车道运行。”当年经济出现 V 型反转,证明陈东琪的预测是对的。2004 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个快速趋势的反应和评价,国际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膨胀”的声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紧缩”的声音;时而有“中国威胁”的传言,时又有“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这时,美国学者克里斯穆尔·佩佐夫提出的“2008 中国大萧条预言”,引起了经济学界强烈反响。对此如何反应? 陈东琪认为,中国经济可以避免大萧条,办法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双稳健政策”。

他解释,“双稳健”有三个涵义,一是“稳”,就是政策取向要保持平稳、稳重,不发生大的、急剧的变化;二是“健”,就是政策操作要健康,要注意科学;三是稳健不单指一个,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稳健。双稳健政策的特征是追求平稳运行,财政、货币政策选择的取向相同,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

在政策措施操作上,他指出,稳健财政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合理确定建设国债规

模、财政赤字规模,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投向,合理确定税收增长区间,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等。稳健货币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稳定货币和信贷增长,微调利率,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等。

他进一步指出,考虑到稳健措施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运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 2008 年前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变化,从而避免佩佐夫预测的“2008 年中国大萧条”。

陈东琪于 2004 年提出的“双稳健政策”,对 2005-2006 年国家实行“双稳健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双稳健政策”不仅在 2005-2007 年防止经济过度泡沫化,避免过度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繁荣后的调整防止过度衰退,避免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双稳健”政策主张,是陈教授于 2004 年主持国家交通部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研究中提出的,但与 1987-1988 年提出“稳中求进”主张的思想一致。所以,经济学界将他作为中国社科院刘国光、张卓元教授为代表的稳健经济学派的重要一员。有人叫他“陈宏观”,有时又称呼他“陈稳健”。的确,陈东琪教授的经济思想,在改革问题上开放的,较为大胆,但在宏观管理问题上稳健的,较为中庸。这不是矛盾,而是对不同问题的科学态度。因为严格说来,改革是一个方向问题,而宏观管理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他在改革的方法上,也是一个稳健主义者,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比如,在 2005 年 7 月中央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三性(主权性、渐进性、可控性)”时,他就坚定地主张渐进性。

有人说,研究或关注历史的学者,其言行比较中庸、温和、稳健。从陈东琪教授的著述来看,他在研究“论”时,比较关注“史”。比如,《新土地所有制》专门设第 10 章“中国土地改革简史”,概述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变化的历史,从中发现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强波经济论》专设“附录 中国的工业化与长波”,描述中国 1840 年以来的工业化和长波变化的历史趋势,从中发现中国经济长波的变化阶段性特征和规律。

陈东琪教授重视专业史研究,还表现在他主编的《1900-2000 中国经济史纲》中。该书线条清晰地描述了中国近 100 年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内容。这本书,按专业史来写,由“社会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企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投资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15 章组成,均由当时经济学界各专业领军人物撰写,如卫兴华、张卓元、戴国晨、尹世杰、田江海、刘溶沧、陈家勤、郭克莎、库桂生、顾海兵等知名学者。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在 2004 年 7 月出版后,学界反应强烈,全国高校纷纷用作基础教材。正如人民日报 10 月 8 日发表的文章所说:

“100 年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舶来品’,而经过 100 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在发育成熟。其中有经济体制转轨的曲折和经济学家研究的艰辛,也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喜悦和经济学家走向世界的坚实脚印。”

我想,这一段简短文字,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发展的整体写照,也适合对陈东琪教授对我国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的高度概括。

陈教授既是一位严谨、勤奋,并极具大视野、大思路和大战略意识的学者,也是一位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益友,更是一位严谨而未虚、善于教人的良师。他在孜孜不倦的研求同时,精心培养学生,帮助后学成长。从 1994 年开始到现在,他培养了 20 多位博士生,他以智者澹然的人生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业和人生。

回首过去,这位学者感谢时代的恩赐,保持着一贯的从容和淡定,藏于内心的始终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使命感和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完)